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6~5

2016年3月9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要厘清的四个认识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高长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和部署。从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正式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到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都做了全面阐述和详细部署,这一问题迅速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各种解读、阐释纷至沓来。笔者以为,要准确领会中央这一决策和部署的精神实质,首先,需要厘清和回答好如下四个认识问题。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具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关系,概括地讲,就是形势

与任务的因果关系。

古语说：“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局”就是形势，“略”就是任务和措施。“谋局”就是要弄清楚形势怎么样、怎么发展；“谋略”就是要弄清楚在既定的形势下该怎么办，该制定什么样的任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谋局”决定“谋略”，面临什么样的“局”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略”。也就是说，形势决定任务，只有认清了形势，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任务和措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作为确定任务和制定措施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党中央坚持这一传统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而作出的科学判断和重要部署。

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 18 大以来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党中央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变，但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调整期，经济延续疲弱复苏态势，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比较大。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兴起，世界各国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发展创新，一些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制定全球经贸投资新规则，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正从

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等新的增长点。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客观状态,具有内在必然性。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任务,并强调,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千头万绪,其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相比于我国经济此前的发展阶段而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供求关系由之前的总体上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过去,我国生产能力滞后,经济发展曾长期处于总体上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阶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扩大投资、提高生产能力上,通过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刺激消费这“三驾马车”的驱动,有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的现象,而且情况更为复杂: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开和产业分工的细化,需求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乏力的局面,各国都在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这些调整的影响无疑也会传输到国内,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可以判断,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 V 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 L 型增长阶段。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综合分

析可见,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是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交织、需求问题与供给问题并存、内部本身问题与外部输入问题同在。但是这些问题的主次是有区别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经济搞好了,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就可以降到最低。

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过去,试图一味靠扩大投资规模、搞强刺激政策,来提高发展速度,作用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可能还会掩盖或加重一些问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抓住了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牛鼻子”。

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意味着 实行需求紧缩或者放松需求管理?

当然不是。党中央多次明确强调,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不能割裂开来,更不能以后者否定前者。

在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转化成结构性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需求侧、供给侧都存在,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由此出发,当然要重点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当前经济工作

的主攻方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抓好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虽然当前我国经济不少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但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市场需求已经完全饱和了。比如，有的产业和地区表面上看需求已经“饱和”，但实际上是“假饱和”，其中不少供给是低端甚至无效供给，真正有效的供给并不充足；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明明供给已经严重超过该行业和需求，还在源源不断地供给；有的产业和地区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从产业上看，那些生产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的产业，从地区上看，那些偏远落后的贫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需求侧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重视供给侧的同时，不能忽视了需求侧，既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搞强刺激，也不能非此即彼搞需求紧缩或忽视需求管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总之，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面，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又互为条件，相互转化。在处理二者关系问题上，既要坚持两点论，两手都要抓，又要坚持重点论，根据经济领域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分清主次，着力解决好重点问题。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吗？

有人担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当然

是一种误解。自党的 14 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注意把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将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轻易改变。

“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本质上涉及到对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理解。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训，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集中有限的资源办大事等方面，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一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日益显现。改革开放后，我们从纠正和克服这些弊端入手，对这一问题作了长期探索并不断取得新的认识成果。从改革开放之初反思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到 12 大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12 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3 大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3 届四中全会后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那段精辟阐述，再到 14 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又经过党的几次重要会议的积累，到 18 届三中全会再次实现新的突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了阐释：“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

效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些论断，是党对计划（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按照18届三中全会精神，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的是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比如，企业竞争机制方面，那些长期处于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状态的“僵尸企业”，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而勉力维持，占用和浪费资源配置；流通体制方面，由于各行业、各地区设置的条条框框过多，导致运输效率低下，物流成本高企，推高了商品的价格，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是要搞新的“计划经济”，更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特别注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18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专门强调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政府及时补位，进行合理的调控和干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具体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上，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应该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好那些

通过市场自身配置不能提供有效供给的问题。

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照搬供给学派的主张？

对于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观点认为，这说明凯恩斯主义不行了，要靠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解决问题，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这种观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混为一谈，犯了舍本逐末、照搬主义的错误。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其一，我们应该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之前没有照搬照抄过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现在也不会照搬照抄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主张，因为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 18 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道理很明显，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客观国情决定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进行的，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注意防范和避免市场经济本身的弊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遵循和前提，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

迷失方向。

其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在内），我们当然要注意加强研究和学习，借鉴其有益成分，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不加鉴别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生产与消费、市场与竞争、货币与金融、成本与价格、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知识和观点，我们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这里有一个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方法问题，我们所要坚持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把一般原理与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方法，也是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都有一个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问题，难道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主张，可以囫圇吞枣、照单全收吗？这显然是不行的，其中必然要有一个依据中国具体实际、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行鉴别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以供给学派的主张为例，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己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社会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主张自由充分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减税刺激投资，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支出，主张保持货币稳定，反对通货膨胀，等等。客观地讲，这其中的有些观点和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无视资本主义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教训，迷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痴迷于供给、结构分析，重视供给管理，忽略需求、总量分析，无视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深入分析产生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

克服的。

其三，关于供给和需求关系的理论，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主张。一提到供给和需求的理论，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想到萨伊、拉弗、凯恩斯、萨缪尔森等西方经济学家；而一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人的印象中只有统而论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实际上这是误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包含了丰富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供给和需求的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供求关系是商品经济的一对基本关系，供给和需求是由生产本身决定的；对供求关系的分析不能离开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供求关系的实质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之间存在交换劳动的关系；供求关系本身不决定价值，但决定价格的波动；供给和需求可以通过调节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价格，促使生产价格形成，而生产价格形成后，价值调节规律转变为价格调节规律，从而调节全社会的商品生产，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大致趋于平衡。客观地讲，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变化，马克思当年提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的一些具体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或者不符合实际了，但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依然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遵循，对我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等各种经济现象，并透过这些现象抓住本质，揭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虽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依然存在，对我们认识、适应、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

济结合上下功夫，把二者的优越性都发挥好，推动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坚持学好用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既重视供给侧，又关注需求侧，既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这些方面，必须头脑清醒、思路清晰，切不可在一些关键的认识问题上不清不楚、糊里糊涂。